

編後語

在本期編輯印刷的日子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度過了六十周年的生日。新中國六十年的變遷，無論是輝煌的成就還是慘烈的人禍，都為人類現代化的歷史留下了濃重的記憶。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家來說，新中國的這一甲子留下了諸多永恆的困惑，必將成為思想探索的永恆源泉。

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家，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國家，這本身就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回答的問題；而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扮演甚麼角色，則更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大問題。在前三十年中，新中國出現了一種極權主義國家：國家試圖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包攬無限的權力，承擔無限的責任。儘管不可能達致絕對的程度，但是國家在那個驚天動地的歲月裏的確擁有了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穿透社會的能力。新中國的後三十年是中國人衝破極權主義的歲月。無論是推進法治，建立市場經濟，恢復私性生活的空間，還是引入民主制度，都意味着有限權力、有限責任型國家的回歸。兩種性質的國家，似乎都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促進作用，也似乎都對中國的發展造成了諸多障礙。千秋功罪，當今的學人如何加以評說呢？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以及「政治與法律」和「人文天地」欄目，選刊了六篇文章，試圖從不同的視角求解新中國六十年的發展所帶來的智識困惑。陳弘毅回顧了新中國在法律虛無主義橫行的「不正常」歲月之後艱難走上法治之路的歷史；然而，執政黨和國家的行為是否應該受制於法律，在中國依然是一個未解的困惑。郭益耀指出，如果不是大躍進的「操之過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曠世悲劇」，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經濟成就堪與後三十年比肩；然而，曾經造就了一時輝煌的計劃經濟為甚麼在世界上的諸多國家土崩瓦解，讓位於能夠造就類似輝煌的市場經濟，依然是經濟學中的一道難解之謎。羅金義、余慧婷記錄了中國少數民族在改革開放之後依然處於「盛世邊緣」的苦難處境；然而，中國所面對的諸多少數民族問題，似乎在所有具有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國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都存在。

最令人困惑的是中國的政治。王耀宗將極權主義政治的興起置於中國現代化的大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揭示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中走出極權主義的艱難。儘管私性生活的空間大大拓展了，但是在中國建立一個保障個體權利與自由的新政治體制，依然是遙遙無期。姚洋指出，無論從社會基礎還是從經濟基礎來看，中國都具備了走向民主化的條件，但是改革開放所造就的「增長共識」以及公民自由的拓展似乎轉移了民眾對民主的關注和熱忱，然而這樣的「增長」不可持續，因為政府的問責性及其對民眾需求的反應缺乏制度的基礎。

有趣的是，張慧瑜告訴我們，上述種種智識困惑在中國內地的電視屏幕上都一掃而光了。近年來，一批新革命歷史劇在大眾文化中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意識形態，以回應、收編諸多批判性敘述的方式抹平了歷史的傷口。過生日，要喜慶。